

南方文论丛书

艺术与审美 的文化阐释

廖国伟 著

YIN SHU YU SHEN MEI
DE WEN HUA CHAN 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方文论丛书

艺术与审美 的文化阐释

廖国伟 著

Y
CHUANS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与审美的文化阐释/廖国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4

(南方文论丛书)

ISBN 7-5004-3372-7

I. 艺… II. 廖… III. 艺术美学—文集
IV. J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5522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206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在人类学的理论视阈中，南方是一个神秘而又充满活力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广西作家陆地的小说《美丽的南方》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一些热血青年就是受这部小说的影响来到广西工作并扎根广西的。

南方当然不应该局限于广西，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又与广西有着密切的联系，广西地处祖国的南疆，属南方的一部分。新时期以来，广西的文艺学队伍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学术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广西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刊物《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东方丛刊》、《民族艺术》、《南方文坛》在学术界就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对于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而言，特别是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建设和发展而言，南方文论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认真思考的。

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已经产生并且还将不断产生更多的具有深刻思想和现实影响力的建设性理论，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学术资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传统、西方文论传统尤其是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思潮、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典文论传统，以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实的文艺和审美文化现象，特别是民间的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中包含着的新的积极因素。这些不同文化力量的相互碰撞、交融和重新组合，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学朝气蓬勃、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21世纪已经来临。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进程渗透到日常生

2015/08

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文化、大众文化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在西方学术界，有学者将后现代时代的文化概括为具有精神分裂特征的文化，这种概括与马克思、卢卡契等曾经思考过的异化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总体特征，国内学者也有不少研究和表述，钱中文先生用“新理性精神”概括，王一川先生称之为“杂语共生”时代。也有学者主张用“余韵风格”这样一个概念，其理论的基础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论。这样一个关键概念自然一时不能统一，事实上也不需要统一，但是这些研究和讨论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我们认为，这是当前文艺学建设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对当代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学艺术实践方面的新问题作出建设性的回应和思考，这既是我们与西方学者进行有效对话的前提，也是有中国特色文艺学建设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大众传媒获得文化支配权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有特色和个性的文化受到重视和喜爱。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对应，文化的个性化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这并不矛盾，恰好是当代社会总体特征的两个方面。在“世界文学”不断发展的时代，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个性和特殊性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这是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的。究其实质，可以看到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心态和理论动机：一种是西方社会和处于经济—文化优势地位的群体对于具有文化差异的异质文化的猎奇和对“他者”文化的热情，这种猎奇和热情事实上是自恋情结和内在虚弱的一种投影。这种投影服从于审美的一般原则：对现实生活中匮乏性存在的追求和渴望。相比之下，另一种文化心态和理论动机是，在全球化和大众文化平面化、标准化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为了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努力阐释具有生命力和个性的文化、文艺现象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从而为不同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作出分析和论证。在这个意义上，“南方”也就具有了文化个性的意义和色彩。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逐渐认同了以上理念，努力在当代社会发展和学术思潮的背景下，积极研究文艺学、美学、文化的一系列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当代性问题、审美人类学的学科构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批评机制的转型、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分析和评价当代西方重要的学术思潮等方面，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为了与学术界的同仁交流和对话，现将近期研究的部分成果集中在一起，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并取名为“南方文论丛书”，以表达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及其文化的热爱。

“南方文论丛书”突出当代性、建设性和开放性，不拘泥既有的观点和方法，鼓励学术创新，特别鼓励有明确学术立场、对当代文化和文艺学的重大问题作出系统研究和阐释的学术专著。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不断出版下去，也希望学界同仁参与建设和对话，共同努力，积极建设具有个性和理论生命力的中国文艺理论。

南方既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南方有青山绿水和富饶的物产资源，也有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和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南方意味着丰富和复杂，也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南方文化如此，南方文论也应该如此。收入丛书中的专著和论文集，尽管存在着不少幼稚和不成熟，但同时也蕴藏着发展和希望。我衷心地祝愿，在“歌如海，花如潮”的南方，理论也是美丽的。

王 杰

壬午年正月初九于广西桂林

后 记

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多年，在此之前，曾在一家学术刊物当过八年的编辑。一方面因为自己对学术的兴趣，一方面也因为职业的需要，陆陆续续写下了以上这些文字。现在，有机会检点自己所写下的这些文字并结集出版，对于我而言是一大幸事。

我们生活于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众多的经典名著和名家的巨著人们都读不过来，何况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浅显之作，如果有人在无聊时偶然翻到我这本集子，或批评其驳杂，或笑其肤浅，也都是我的幸事。

借此机会，感谢给我的文章以结集出版机会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感谢在我学术成长道路上曾给过我各种帮助的师长、同仁和朋友。

是为后记。

廖国伟

2002年2月12日



作者简介

廖国伟，男，汉族，1958年11月生于广西桂林。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现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副教授、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从事文艺理论、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在《江汉论坛》、《鲁迅研究月刊》、《东岳论丛》、《学术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曾参与艺术学科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史·隋唐卷》的编撰工作。

..... 内 容 简 介

艺术和审美是一项复杂而且牵涉面极广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它把一切与其相关的社会物质文化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凝聚在艺术文本和审美活动的周围，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看艺术和审美以及从审美和艺术的角度去反观文化都是必然的。本书即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对艺术和审美进行阐释，在对艺术现象和审美活动的分析中，作者对艺术和审美所牵涉到的诸种文化因素，如艺术与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艺术与文化传统、艺术与民族文化心理性格、艺术与时间、艺术与象征以及审美活动与人类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表达机制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在努力揭示艺术和审美活动与文化的诸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为参照系的基础上，阐发了艺术与审美活动的文化意义。

目 录

试论古典农耕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审美需要	(1)
审美需要的生理基础与心理基础	(14)
社会情境的艺术文化学意义	(25)
艺术与人类的诗意存在	(41)
艺术与时间	(47)
试论艺术再现与艺术表现	(59)
意象论	(79)
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意象与民族心理性格的阴柔倾向	(95)
试论中国古典诗词的听觉意象	(107)
绘画：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118)
隋唐美术理论的形态特征及其理论建树	(127)
唐代书法理论的形态特征与理论成就	(157)
音乐：音响的象征性与意义性	(168)
阿 Q 精神与人类的精神自慰本能	(180)
大众文化的情感指向和特征	(191)
自然山水的文化意义	(205)
哲学家的个人气质对其学说的影响探微	(215)
儒家的伦理思想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23)
试论社会转型对生活方式和心理经验的影响	(240)
后记	(249)

试论古典农耕社会与现代 工业社会的审美需要

审美需要作为一种心理欲望的对象化和现实需要的想象性满足和实现，它是与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表达机制密切相关的，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人们的文化表达机制即心理欲望的释放和表达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审美需要也以不同的形态而呈现出来。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受到社会形态以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制约的人们的审美需要的表现方式相应的也发生了变化，尽管从古至今人们的基本需要和欲望是相同的，但是对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和实现方式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对不同社会结构形态下的审美需要的形态和变化也应加以分析和阐述。

一、古典时代的审美需要及其表现形态

古代社会是以农业为主导经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农村是作为生产的中心，马克思·韦伯说过：“古代城市的经济盈余，总是以拥有土地的诸侯和贵族从他们的臣民头上所收割来的地租和税收作为最初基础的……这种财富的来源和与这种来源相联系的政治状况在整个古代一直对城市的经济‘繁荣’同时也对城市的经济迅速衰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代城市总是作

为消费中心甚于作为生产中心的。”^① 在韦伯看来，作为生产中心的农村经济制约着整个古代城市的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农业经济在古代社会经济结构中起着主导和支柱性的作用。这一点在西方和中国古代社会都是相同的。

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以农田为基础、自给自足的家庭式个体生产，或者是庄园制式的松散的集体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作为劳动力主力的是耕种土地的农民以及个体作坊的工匠，韦伯指出：“古代不仅曾存在不自由的和半自由的农民；同样，还存在着与村舍工业和奴隶作坊的自由匠人生产……此外还存在着家庭作坊、个体经营作坊（最常见）……”^② 在这种生产方式所制约的经济结构中，自给自足是人们生产的主要目的，交换及赚取货币只是作为自给自足经济的一种补充，还没有像在后来资本主义阶段的那种情形——“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惟一对象”^③。

事实上，重农轻商不仅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现实，而且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前期是一种基本国策，封建统治者不仅“重农轻商”，而且“重农抑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案可查的。比如中国汉代的法律就规定：商人及市井之子孙等五种人不得为官。据《汉书》记载：“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德高后之时，复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为官吏。”^④ 古代社会的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当然不是由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所决定的，而是受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结构制约的结果，因为，在产品剩余不多的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社会里，鼓励和放任商业的发展无疑会扰乱或动摇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作

① 马克思·韦伯著，黄宪起、张晓林译：《文明的历史脚步》，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页。

④ 班固：《汉书》（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2页。

为商人来说，赢利或牟取暴利是商业及其商业的本性使然，尤其在那种商品生产和交换制度没有建立（更无从说完善）的社会里，所以，中国古代圣人以“不贵难得之货”^①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训诫，其中蕴含着对商业本性的一种警惕。

重农抑商虽然是与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一种政策措施，然而对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抑制就不仅仅是抑制了一个行业的发展与繁荣，而且还极大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以及文化表达机制，也即制约着人们的欲望的表达和实现方式。

事实上，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证明，伴随着生产力发达和产品的极大剩余而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以及文化表达方式也有了极大的改变。

从总体上看，农业经济时代与后来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时代相比，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以及文化表达机制是不相同的。在农业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生活方式和产量的少量盈余使得古代社会中人们的欲望是相对单纯的，在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②的生活方式中，“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即是农民理想的幸福生活，在这种以农田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中，耕种在土地上的是“自由”和“半自由”的农民，虽然他们仍受到地租及种种赋税的盘剥，但是，他们的劳动还不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异化”，以及劳动者完全与他们自己产品相敌对。在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劳动异化”中，“劳动者生产愈多，供他消耗的就愈少，他创造的价值愈多，他自己就愈无价值，愈下贱；他的产品造得愈美好，他自己就变得愈残废丑陋；他的对象愈文明，他

① 《老子·三章》，《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页。

② 《古诗源·击壤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

自己就变得愈野蛮；劳动愈有威力，劳动者就愈无权；劳动愈精巧，劳动者就愈呆笨，愈变成自然界的奴隶”^①。而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在缴纳了一定的地租及赋税之后，剩余的产品愈多，他们就愈能接近那种“丰衣足食”的生活目标，故而，他们的劳动产品并非完全与它们相敌对，他们积极劳动的动力，一部分来自赋税和地租的压力，一部分来自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一句话，他们的劳动并非是完全的异化劳动，在他们看来，努力劳作并非全为他人，这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在正常的年月以及较开明的封建朝代，农民们的这种生活目标并非是遥不可及的，比如在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中所描绘的那种“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女耕桑不相失。……”（杜甫《忆昔二首》）^②虽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等种种因素，杜甫所描绘的那种丰衣足食的开元盛世并不是时时都有，但是，在农业经济时代的农民，尽管贫困、生活简单，然而在他们看来，生活和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它们并不像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工业社会的人们那样，对未来充满着茫然和绝望，这一点，对于文化表达机制的影响是很重要的。“男耕女织，勤劳致富”是农业经济时代的生活信念，而在大机器生产中作为一个机器部件的工业时代的劳动者来说，勤劳只能使资本家致富。

总之，在农业经济时代里，“劳动异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异化”的程度都不是剧烈的，这样，在这个时代里的人相对而言是较为自由和完整的人。从欲望的表达和实现机制方面来说，虽然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条件下，都存在着人的欲望要求和这种要求实现上不可能达到的矛盾，但生活在希望之中的农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② 《杜工部集》卷五，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81页。

业经济时代的人们，他们相信欲望要求和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断裂是暂时的、可以弥补的，故而它们至少在心理上能达到一种超越与和谐，至少在整体上没有绝望。个体的绝望也因为人们集体的希望的存在而变得崇高，从个体上说，屈原、孔子是绝望的，但因为集体希望的存在，孔子和屈原绝不颓废，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将人格升华到审美的境界。所以，孔子、老子、陶渊明、柏拉图、培根等人都设想并希望着一个理想社会的到来。这一点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审美表达方式的影响是很大的。

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考德威尔曾指出过原始采集或狩猎时代中与农耕时代中艺术的差别，他说：“原始的采集植物或狩猎的部落使自己身处于自然界，在自然界发现它自己的欲望。它全面改变自身以求得与自然一致。因此它的艺术是自然主义的、重感官观察的……种植谷物和圈养牲畜的部落代表了一种进步。它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通过驯化动植物使自然符合自己的欲望。它的艺术是有常规并带有目的性的。”^① 考德威尔在这里说的是原始社会中采集或狩猎和农耕文明两个阶段中人们欲望对象化方式的不同，然而，如果从整体上去考察整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古典时代的艺术和审美活动，就会发现，考德威尔所说的那种“通过驯化动植物使自然符合自己的欲望”的对象化方式和思维方式，实际上一直延续下来并贯穿了整个古典农耕社会。而那种“全面改变自身以求得与自然一致”的对象化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未被完全弃置，它同“使自然符合自己欲望”的对象化方式一起共同影响和制约着古典时代的艺术和审美活动。

我们知道，一种欲望的对象化方式它不仅与一个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社会状况有关，同时，它也是对以往的对象化方

① [英] 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3 页。

式和思维方式的延续和继承，只不过在新的时代中有所变异或在高一级的形态上加以发展。

从审美需要的角度来说，在整个农业经济时代的古典社会里，人们在面对着心理欲望与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实现的分裂、对立的矛盾时，他们通常采取三种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一是以直接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改造对象并使对象符合自己的欲望（如同驯化动植物一样）；二是以幻想的方式使对象符合自己的欲望，使欲望在想象中得以满足和实现；三是在激情与想象中改变自身以求得自身与对象和现实的一致（对象成为它自身、欲望与对象的同一）。这三种欲望对象化方式的展开都使得农业经济时代的人们相信，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是暂时的、局部的、相对的，而非永久的、全部的、绝对的，人们的努力和劳作终将有所回报。又因为农业经济时代的劳动者并非是那种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劳动异化”，在人们的想象中，人与现实、欲望与对象的分裂和对立也不像现代社会那样剧烈和不可弥合，人们对欲望与实现、人与现实的断裂的修复与弥合以及对于未来都充满希望，这样，在审美活动中，人们的欲望与满足、自身与对象、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总是能达到或趋向于一种和谐与一致，尽管这样的和谐一致通常是以想象和虚幻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典社会的审美需要是以人们在想象中努力修复和弥合欲望与满足之间的断裂为目的，以在心理上达到现实与愿望、对象与欲望和谐一致的一种心理需要，这种审美需要在审美活动中是以审美形象的优美和谐、现实世界与心理欲望的相符合、对象与自身的想象性一致为基本特征的。由此去考察农业经济时代的艺术及其他审美活动，我们即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从古希腊、罗马的建筑、雕刻、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拉斐尔的绘画、17世纪荷兰的绘画、法国的新古典主义、18世纪的法国农村风景画甚至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都是以优美、和谐、宁静的审美形象出现的；在中国从魏晋时期的山

水诗到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也都是以优美和谐为主调的。即使创作者自身处于人与社会、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剧烈的分离与矛盾中，人们也总是期望以艺术和审美活动去修复、弥补这种种裂痕与创伤，叶舒宪先生对中国古代美人幻梦原型的分析即是一大例证。^①难道不是么？在现实的困顿和内心剧烈的痛苦中，人们创造出来的仍然是优美和谐的艺术形象：如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闲情赋》、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于是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包拯、海瑞的清官形象在中国社会能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以此为题材的戏曲、小说、故事能历久不衰，而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为什么都要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些都是受农业经济时代的审美需要和对象化方式制约和影响的结果。

二、现代社会的审美需要及其表现形态

如果说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时代的话，那么，现代社会无疑是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时代。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科技的发达与进步、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强烈地影响和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等诸多领域，并进而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表达方式等方面。现代社会与古典农业经济社会不同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分裂更为剧烈，产品的巨大剩余也更强烈地激发了人们的财富欲望，现代人在人与现实世界、欲望与满足现实的对立与分裂中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在现代人看来这种对立与分裂不再是可以弥合和修复的，未来和希望逐渐在这种分裂和对立中消逝殆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那种

① 参见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